DOI：10. 13504/j. cnki. issn1008-2700. 2026. 05. 002

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水平测度及平衡推进路径

陈甬军[1,2]，陈义国[1]

（1. 广东财经大学　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320；
2.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以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解决好各地区统一市场建设推进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本文聚焦商品市场维度，运用价格法对 1997—2024 年中国商品市场分割指数进行测算，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演变规律与区域特征，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整体建设路径提供商品市场维度的经验依据。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全国商品市场分割水平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市场整合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区域市场整合水平差异明显，四大经济区市场统一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对差异来源的分析显示，区域差异是造成整体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区域内差异的贡献度较低且保持稳定。趋势演化分析发现，高分割与低分割区域均存在“粘性效应”；即区域一旦处于某种分割状态，便容易长期维持该状态。市场整合是一个“边际改进”的渐进过程，难以实现跨越式跃迁。在空间特征方面，高（或低）分割水平的地区会促使邻近地区向高（或低）分割水平转变继而产生市场分割的集聚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商品市场分割；区域差异；粘性效应；市场整合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26）05-0020-15

一、问题提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的是全面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自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和系列配套措施相继发布以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取得积极成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专章论述了“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问题，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又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这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收稿日期：2026-03-04；修回日期：2026-0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一带一路’建设新发展研究”（24&ZD2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融合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检验”（24YJA790003）

作者简介：陈甬军，广东财经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陈义国，广东财经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教授，通信作者。

设已进入逐个消除卡点堵点的纵深推进阶段。

自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来，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内涵不断深化，从早期聚焦现代流通业逐步拓展覆盖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始终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同向而行、协同推进[1]。近年来，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进入了全面推进时期。经过多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基本形成，公平竞争环境逐步建立。同时也要看到，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具体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国大市场统一程度，统筹提升各地区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行为，已经成为全面改革攻坚阶段的工作重点。因此，本文对全国大市场统一程度进行整体测度和区域分析，进而提出优化提升的具体路径，能够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包含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服务市场、制度规则、市场准入等多维度内容，本文力求在商品市场维度率先取得突破，为后续多维度研究提供参考。

目前已有少量文献在省级层面测算了市场的整合情况，由于地理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在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并不均衡[2]，基于地理因素或经济规划形成的各区域市场统一程度更是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省级政府承担着承上启下的经济、政治职能及地区发展重任，是区域间重要的经济竞争主体，彼此之间的统一市场建设行为相互影响。现有研究多聚焦省级层面市场整合测度，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空间异质性分析不足，尤其缺乏对区域间政策互动与市场分割溢出效应的系统性识别，难以支撑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设计。因此，本文采用 1997—2024 年的商品价格指数，利用价格法测度省级商品市场分割指数，分析中国整体市场统一程度的演变规律与区域特征，并采用长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系统分析四大经济区商品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为分区域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中国市场整合问题已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研究，围绕“是否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分割的程度与演变趋势”“市场分割的成因与破解路径”“区域间的空间关联”等问题形成了丰富成果。具体如下。

在市场分割程度与演变趋势方面，早期研究聚焦于回答“中国市场是否存在分割”这一问题。诺顿（Naughton）以省际贸易流入流出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指标，发现省际贸易份额较高，提示市场整合程度可能被低估[3]。蓬塞（Poncet）利用省际贸易流量数据进一步发现，省际贸易占 GDP 或总贸易的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呈现显著下降趋势，意味着地方保护程度可能有所增强[4]。使用价格法的研究同样存在分歧：喻闻和黄季焜对大米市场的研究发现市场分割显著[5]；但桂琦寒等、陈敏等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开创性研究以及陆铭和陈钊对商品市场分割的长期追踪，则确认了市场整合的总体态势[6-8]；胡向婷和张璐对产业差异度的测算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升[9]。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数据可得性的提升和研究方法的完善，研究结论逐步趋于收敛：多数基于价格法、贸易流量法及要素市场数据的证据表明，中国市场分割程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市场整合进程总体在加速[10-12]。吴华强等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中国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持续提升，但劳动力、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地方保护和要素流动的行政管制仍是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13]。总体来看，“市场分割长期存在但整体趋于缓和”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性判断，分歧主要集中于不同维度（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不同区域间整合进程的非均衡性。

在市场分割的成因方面，现有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制度性因素、地理与基础设施因素、外部冲击因素三类。制度性因素方面，陆铭和陈钊揭示了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的内在机制[8]，吕冰洋和贺颖从财政激励体制视角阐释了地方保护的形成逻辑[12]，陈甬军系统剖析了地区封锁的生成机制[14]。在地理与基础设施方面，范欣等发现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打破国内市场分割[10]；马鑫和黄涛以高速公路为例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间市场整合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交通网络的薄弱正是其市场整合滞后的重

要约束[15]。外部冲击方面，柒江艺和阳立高揭示了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向国内传导的机制，2003 年公共卫生事件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都曾使市场分割指数出现阶段性反弹[16]。

在市场分割的破解路径方面，近几年的研究呈现出“技术赋能”与“政策协同”两条主线。技术赋能方面，赵静梅等、夏杰长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与物流成本、突破行政边界约束来显著弱化省际贸易壁垒，且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17-18]；宋枫等以电力市场为典型场景进行量化评估，发现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可带来显著的社会福利改进[19]。政策协同方面，林晨和李宇潇构建量化空间均衡模型发现，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时，中央制定并实施统一产业政策优于地方开展分散竞争[20]；龚锋和马旭基于地方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的跨区域合作更有利于降低省际贸易壁垒[21]。

在市场分割的空间特征与区域关联方面，市场整合不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过程，更是一个空间维度的过程。区域间的统一行为（或分割行为）存在很强的联动性，高（低）分割区域的邻近地区往往表现出向高（低）分割方向转变的倾向。然而，现有研究对市场分割的空间互动机制关注不足，缺乏对区域间溢出效应与路径依赖的量化识别。既有研究多聚焦省级层面市场整合的总体测度，对区域市场的空间异质性分析不足，尤其缺乏对区域间政策互动与市场分割溢出效应的系统性识别[22]。郑毓盛和李崇高从技术效率视角量化了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23]，陈甬军等基于省际经济波动溢出效应揭示了区域间市场联动的复杂性[24]，但都未系统刻画市场分割的空间演化特征。这一研究缺口构成本文的重要切入点。

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中国市场整合的复杂性，尽管部分结论存在分歧，但整体显示，21 世纪以来中国市场分割程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尤其是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整合进程在加速。由于市场统一涉及不同区域间的经贸关系，区域间的统一行为（或分割行为）存在很强的联动性，本文尝试在这一方向做出边际贡献。为此，本文在利用价格法测度省级商品市场统一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分析区域间市场统一程度的空间关联演化规律，以探索市场整合度与区域空间的关系，为整体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依据。

三、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相对价格法测算方式

相对价格法基于“一价定律”，假定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相同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应趋于一致，价格差异反映市场分割程度。相对价格法基于“冰川成本”模型，通过引入运输损耗对“一价定律”理论的理想化假设进行了修正，将运输成本类比为“冰川融化”的过程。以 a 和 b 两地为例，假定某种商品 k 在 a 地的售价为 P_a，在 b 地的售价为 P_b，运输导致的损耗价值为每单位价格的一个比例，记为 $c(0<c<1)$。此时，只有当 $P_a(1-c)>P_b$ 或者 $P_b(1-c)>P_a$ 时，才可能产生套利行为。当商品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时，市场均衡情况下商品 k 的相对价格 P_a/P_b 将在无套利区间 $[1-c,\ 1/(1-c)]$ 内波动。所以，度量不同种类商品 k 的相对价格的方差波动范围可以反映市场分割程度。

具体而言，对两地 a、b 在 t 时期的商品 k 的价格比取对数 $Q^k_{ab,\,t}=\ln(P^k_{a,\,t}/P^k_{b,\,t})$，目的在于使异方差和偏态性得到缓和。本文获得的原始数据是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指数。通过等量代换，利用环比价格指数构建的相对价格比的一阶差分为：

$$\Delta Q^k_{ab,t}=\ln(P^k_{a,t}/P^k_{b,t})-\ln(P^k_{a,t-1}/P^k_{b,t-1})=\ln(P^k_{a,t}/P^k_{a,t-1})-\ln(P^k_{b,t}/P^k_{b,t-1}) \tag{1}$$

由于对价格取对数后省份对内部的排列顺序会改变 $\Delta Q^k_{ab,t}$ 的符号（即 $\Delta Q^k_{ab,t}$ 与 $\Delta Q^k_{ba,t}$ 互为相反数），进而影响方差计算结果，所以对 $\Delta Q^k_{ab,t}$ 进行取绝对值的处理，借此消除符号敏感性。此外，为排除商品异质性引发的不可加效应，采用去均值法剥离与特定商品类别相关的固定效应：

$$q^k_{ab,t}=\varepsilon^k_{ab}-\overline{\varepsilon^k_{ab}}=|\Delta Q^k_{ab}|-\overline{|\Delta Q^k_{ab}|} \tag{2}$$

商品维度上的方差 $Var(q^k_{ab,\,t})$，即可反映两个省份在 t 时期的市场分割程度 $Seg_{ab,t}$。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对共享行政边界的相邻省份对进行测算，共得到 66 组有效省份对。限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中的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海南。选择相邻省份的原因是：相邻区域是政策溢出、要素流动、市场互动的核心场景，地理邻近性使得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关联效应更强，有助于精准捕捉省际市场壁垒的真实影响。本文将 66 组省份对的指数按省份维度纵向聚合，构建两省份间的市场分割综合指数数据集，市场分割指数均采用其与所有相邻省份分割指数的均值表示，最终生成包含 812 个观测值（29 个省份×28 年）的面板数据集。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价格法的测算依赖于时间、区域、商品的三维面板数据结构。本文的基础数据取自 1997—2024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时间上取 1997 年为观测起始点，是因为 1997 年设立重庆为直辖市后，省级行政区划趋于稳定，重庆自此作为独立统计单元连续发布价格数据，同时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也自该年起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实现了完整的分省连续列示。以 1997 年为起始点既保证了 29 个省级观测单元面板数据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也与既有文献[8] 的测度口径保持可比。代表性商品种类包括粮食、鲜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中西药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以及燃料，得到方差数据共 7 308 个（28 年×29 省×9 类）（见表 1）。采用年度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开展测算，存在三点局限：一是年度数据难以捕捉月度层面的短期价格波动，可能低估临时性市场壁垒的影响；二是 9 大类商品覆盖范围有限，未包含高端消费品、生产资料等品类，且部分品类（如燃料、中西药品）存在行政定价特征，可能影响测算精度；三是价格指数易受共同通胀、统计口径调整等因素干扰。但该指标是目前公开可得的、时间序列最长的商品价格面板数据，且与同类研究口径保持一致，具备较好的横向可比性。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粮食价格指数	812	102. 751 4	82. 300 0	98. 900 0	137. 922 3	6. 729 4
鲜菜价格指数	812	105. 139 3	82. 643 0	94. 400 0	139. 804 0	7. 760 2
饮料烟酒茶价格指数	812	100. 938 0	92. 700 0	103. 350 0	112. 103 5	1. 972 2
服装鞋帽价格指数	812	100. 166 1	88. 800 0	102. 050 0	110. 000 0	2. 468 4
中西药品价格指数	812	101. 358 3	86. 881 9	102. 700 0	115. 600 0	3. 021 5
书报杂志价格指数	812	102. 580 4	94. 700 0	111. 650 0	134. 100 0	3. 901 6
文化体育用品价格指数	812	99. 749 9	87. 617 1	100. 800 0	108. 200 0	2. 054 1
日用品价格指数	812	100. 480 2	94. 900 0	105. 250 0	109. 600 0	1. 679 1
燃料价格指数	812	105. 085 6	83. 500 0	129. 300 0	156. 900 0	8. 468 8

注：以上期价格为 100，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市场分割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前文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根据价格法测算得到中国商品市场分割指数①。

（一）整体市场分割水平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中国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从 1997 年的 0. 001 199 降至 2024 年的 0. 000 078，累计降幅达 93. 5%，表明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商品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从变化节奏看，1997—2008 年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价格双轨制并轨等市场化改革推动，指数年均降幅为 8. 2%；2008—2015 年受金融危机

① 限于篇幅，各省份指数的详细结果不再报告，备索。

等外部冲击影响，整合速度阶段性放缓，年均降幅为 3.7%；2015 年后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2022 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顶层政策出台，2020—2024 年年均降幅回升至 12.3%。中国商品市场分割指数整体呈现“快速下降—波动放缓—加速收敛”的三阶段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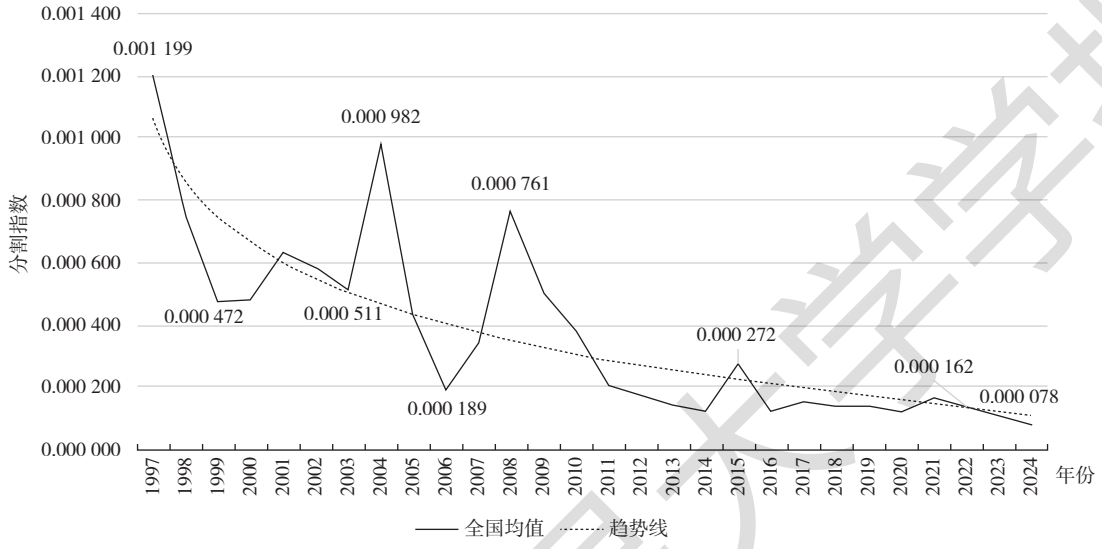


图 1　1997—2024 年中国商品市场分割指数

全国市场整合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市场分割指数在 2004 年、2008 年及 2015 年出现三次明显反弹，反映了外部冲击对市场整合进程的阶段性干扰，其驱动机制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 2004 年，公共卫生事件与市场化改革的双重效应

谢一青和邵军分析指出，2003 年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导致区域市场短期封闭，地方政府为稳定就业和税收，对农产品、医药等关键物资实施临时流通限制，直接推高了 2004 年市场分割指数[25]。与此同时，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外贸经营权放开加剧了国内企业竞争压力，地方政府通过隐蔽性政策工具（如技术壁垒、采购偏好）保护本地企业，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分割效应[26]。这一阶段的波动体现了市场化改革深化与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矛盾，反映了转型期政策协调的复杂性。

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与政策对冲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网络迅速传导至国内商品市场。危机初期，出口导向型省份为维持短期增长，对原材料进口和中间品流通实施区域性管制，导致省际贸易成本上升；随着危机蔓延，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通过统一调配资源、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网络），间接促进了市场整合度回升[27]。这一过程揭示了外部冲击下地方保护与国家战略的动态博弈，凸显了全国统一政策在危机应对中的关键作用。

3. 2015 年，局部金融波动与市场韧性提升

2015 年股市大幅波动对商品市场的冲击从范围和时间上看均弱于前两次，主要影响集中于金融关联度较高的大宗商品（如钢材、有色金属）[28]。地方政府虽暂时强化了对能源、矿产等行业的准入限制，但得益于前期要素市场化改革（如 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市场自我修复能力显著增强，分割指数波动幅度收窄至 0.000 15 以内。这一特征表明，随着统一大市场制度框架的逐步完善，市场对外部冲击的缓冲机制初步形成。

（二）四大经济区市场分割水平分析

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禀赋与地理条件的显著异质性，直接导致市场分割水平呈现非均衡特征。

为系统考察 1997—2024 年间国内市场整合的空间分异规律，本文采用最为常见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划分进行分析①，区域层面市场分割指数由区域内各省份的市场分割指数算术平均得到。图 2 报告了各地区市场分割指数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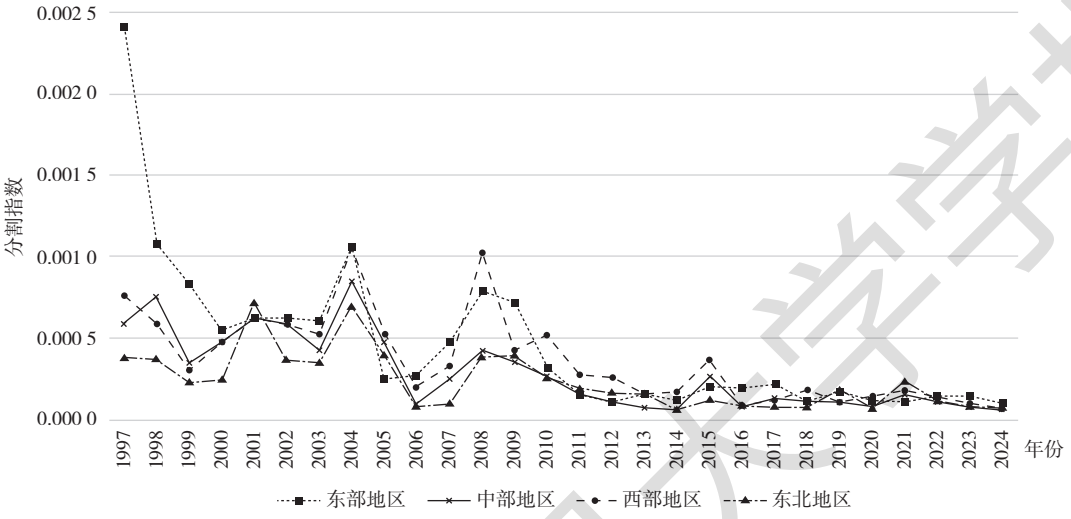


图 2　1997—2024 年四大经济区市场分割指数变化趋势

通过对四大区域市场分割指数的期初值、期末值与样本期均值进行交叉验证，结果一致显示四大区域市场统一程度呈现显著梯度分化特征：东北地区市场分割指数最低、统一程度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市场分割指数最高、统一程度最低，这一结论与王昀和孙款款[29] 的同类研究结果形成互证。上述区域差异化特征是区域发展禀赋、产业演化路径与地方治理行为长期耦合的结果：

一是东北地区的低分割特征源于历史基础与政策协同的双重支撑。分析期初东北地区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与交通网络，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跨省市产业分工惯性较强，区域内能源、装备制造、农产品供应链协作网络成熟，省际商品流通的制度性与技术性壁垒本就处于较低水平；叠加东北振兴战略下区域协同机制的持续完善，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的跨区域合作更有利于降低省际贸易壁垒、促进市场整合。东北地区依托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形成的省际合作网络，在产业协同与交通互联等领域较为完善，有效降低了区域内贸易成本[21]。

二是中部地区的中等分割水平是交通优势与产业同质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地理区位与平原地形造就了发达的交通网络，省际要素流通的成本较低，为市场整合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区域内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各省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争夺市场份额易出台隐性地方保护政策，推高了区域内市场分割水平，这一特征与陈甬军[14] 对中部地区地方保护动机的分析结论一致。

三是西部地区的中等分割水平核心约束为地理禀赋与基础设施的空间不均衡。受高原、山地占比高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历史供给水平较低，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市场联通；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战略实施后，骨干交通网络得到极大改善，但部分偏远地区的交通连通性仍然薄弱，成为市场整合的突出短板。

四是东部地区的高分割特征是外向型经济路径依赖、地方竞争与税制差异共同驱动的结果。首先，东部地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各省均形成了独立的外贸体系与生产配套网络，省际商品贸易占比偏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低、内部流通动力不足[30-31]；其次，地方政府间 GDP 锦标赛竞争更为激烈，省际合作协议中存在大量产业同质化竞争相关条款，地方保护的内生动机更强，推高了省际贸易壁垒[22]；最后，省际税收分成差异显著，谢贞发和王震研究证实东部各省份增值税留存比例差异最大超 10 个百分点，税收激励不平衡直接引发资本要素向高留存地区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市场分割[32]。

整体来看，自然地理禀赋、产业分工格局、地方政府行为三类核心因素在四大区域的作用强度与组合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时段各因素的主次地位动态调整，共同导致了四大区域市场分割强度的差异化演化规律。

从变化趋势来看，四大区域的市场分割指数水平整体上与全国市场分割指数的波动下降趋势一致，但部分年份的变化趋势又呈现出一定特点。一是东部地区 1997 年后的分割指数急剧下降，市场整合成效显著。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建设与加速整合，有效提高了区域间经济的联系程度。二是西部地区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反应剧烈，市场分割波动严重。可能的原因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西部地区主导产业有色金属（如云南铜矿、贵州磷矿）和能源产品价格剧烈震荡。以铜价为例，受金融期货市场影响，2008 年大幅度下降，有色金属产业遭受重创[29]。政府为稳定就业和税收，临时强化对矿产、电力等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导致区域间政策壁垒短期激增。此类应急措施与后续经济刺激政策的交替执行，造成指数剧烈波动。

（三）市场分割区域差异及来源分解

为系统识别中国市场分割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动态演变，采用达古姆（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从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三个维度对 1997—2024 年四大区域市场分割指数进行测算与分解，揭示差异来源及贡献度变化规律。

1. 市场分割差异的来源与贡献度特征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见图 3）显示，中国市场分割水平的差异来源呈现以下结构性特征：组间差异的贡献度在研究期内远高于组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呈现出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组内差异的贡献度整体在 20%的占比附近波动，变化幅度较小，自 2012 年起组内差异的贡献度开始波动上升；超变密度贡献率与组间差异贡献率没有明显趋势，在部分年份呈现出陡峭的急速上升与下降情况，2016 年后组间差异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超变密度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整体而言，地区间差异构成了地区差异的最主要来源，要推动中国市场整合程度的整体水平提升，应该重点关注地区间差异的缩小；超变密度贡献率的上升趋势提示需要警惕区域间政策不协调导致的“碎片化整合”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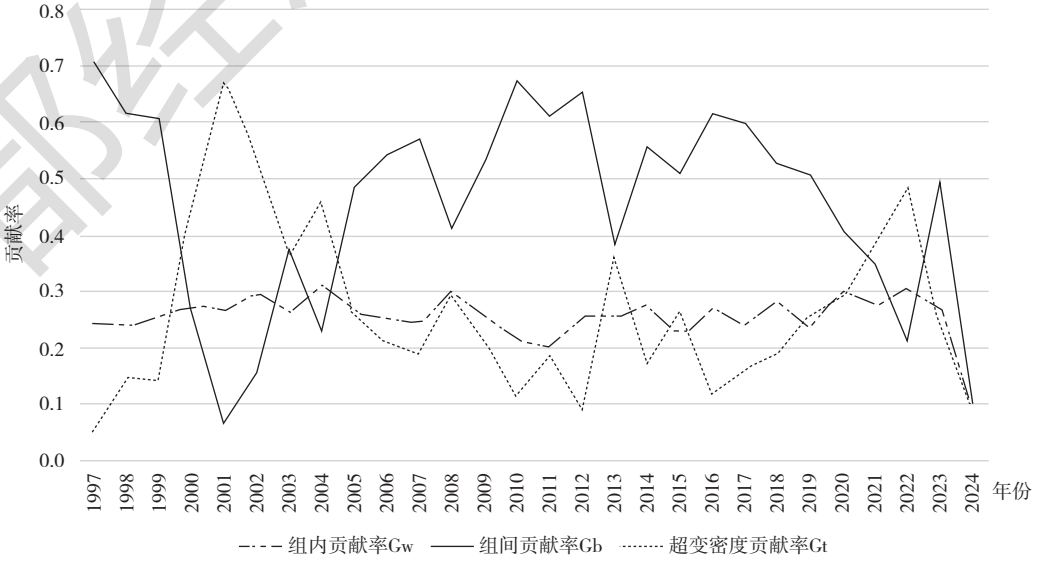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市场分割指数地区差异来源及贡献率变化趋势

2. 总体差异与空间异质性格局

从图 4 可以看出，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动趋势：全国市场分割总体基尼系数在 0.2~0.5 区间剧烈波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特征。1997—2004 年下降阶段：得益于市场化改革深化（如外贸经营权放开、价格双轨制并轨），市场要素流动壁垒逐步降低，基尼系数从 0.48 降至 0.32。2004—2009 年上升阶段：受 2003 年公共卫生事件、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地方政府短期强化市场保护，基尼系数反弹至 0.45。2009—2024 年波动收敛阶段：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京津冀一体化）推进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市场整合重回正轨，基尼系数稳定在 0.30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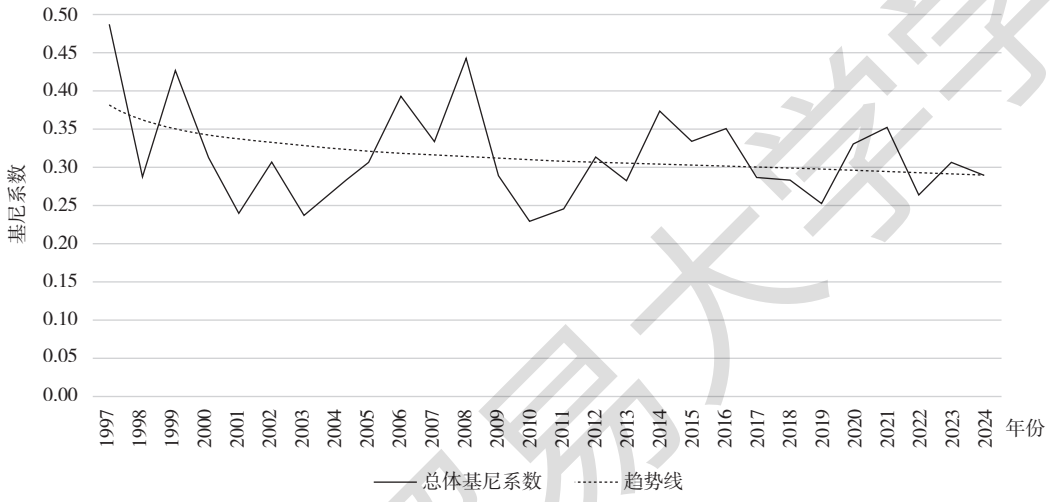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市场分割指数总体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3. 区域间差异的动态演变规律

从相关梯度分布（见表 2）可以看出：四大区域内部差异呈现为三种类型。高差异区：东部地区（组内基尼系数均值为 0.300 5）、西部地区（组内基尼系数均值为 0.248 7）。前者源于东部各省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显著，各自拥有独立的外贸体系与产业分工体系，省际商品流通规模偏低、同质化竞争突出；后者则受自然地理条件约束与区域内发展水平差距影响较大（如成渝经济圈与西北、西南欠发达省份的发展差距），内部整合成本较高。中差异区：中部地区（组内基尼系数均值为 0.188 7），内部差异主要源于产业结构同质化导致的地方保护动机，各省为争夺产业转移项目与市场份额容易设置隐性流通壁垒。低差异区：东北地区（组内基尼系数均值为 0.096 2），得益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产业分工协作基础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下区域合作机制的持续完善，区域内要素与商品流通顺畅，整合程度最高。

表 2　四大经济区市场分割指数基尼系数

	组内基尼系数				组间基尼系数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东部-东北	中部-西部	中部-东北	西部-东北
1997	0.521 0	0.087 9	0.164 6	0.006 4	0.630 2	0.576 5	0.726 0	0.175 9	0.209 9	0.330 2
2000	0.377 5	0.207 1	0.245 9	0.149 8	0.331 7	0.350 4	0.430 3	0.250 7	0.323 7	0.331 4
2005	0.153 9	0.261 5	0.314 5	0.046 5	0.329 3	0.396 1	0.230 8	0.310 5	0.225 6	0.245 8
2010	0.109 3	0.234 8	0.162 0	0.059 2	0.209 1	0.244 7	0.132 7	0.339 8	0.176 4	0.334 6
2015	0.279 6	0.422 1	0.182 7	0.035 1	0.393 6	0.320 9	0.320 7	0.404 4	0.393 8	0.507 0
2020	0.257 5	0.212 3	0.371 4	0.077 1	0.284 3	0.336 9	0.326 8	0.368 1	0.202 1	0.405 7
2024	0.410 8	0.117 3	0.198 3	0.014 0	0.359 0	0.367 1	0.352 3	0.167 2	0.097 7	0.149 9
均值	0.300 5	0.188 7	0.248 7	0.096 2	0.336 8	0.353 6	0.362 2	0.291 8	0.231 8	0.307 5

区域间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极端差异组合中，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组间基尼系数均值 0.362 2）为差异最大的区域对（次高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均值 0.353 6），反映外向型经济主导的东部沿海与重工业基地属性的东北地区，在产业结构、市场体系上的适配性较低，跨区域市场整合壁垒突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均值 0.231 8）为差异最小的区域对，得益于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协同推进以及两地在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产业互补性，跨区域能源调配、产业转移合作开展顺畅。

差异变动趋势方面，既有收敛趋势显著区域对：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基尼系数从 1997 年的 0.209 9 降至 2024 年的 0.097 7，降幅 53.5%）、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从 0.330 2 降至 0.149 9，降幅 54.6%），主要受“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协同推动，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与产业转移合作持续深化；也有局部发散趋势：东部地区组内基尼系数从 2010 年的 0.109 3 升至 2024 年的 0.410 8，增幅达 275.8%，反映近年东部省份在外贸承压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核心都市圈的区域内整合与省际壁垒并存的特征凸显。

（四）中国市场分割的演进趋势分析

1. 市场分割指数水平的时序演进趋势

为揭示中国商品市场分割水平的内部演变特征及长期趋势，采用马尔科夫（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分析法，基于省级市场分割指数的四分位数（0.000 107、0.000 220、0.000 451），将市场分割水平划分为低分割（Ⅰ）、中低分割（Ⅱ）、中高分割（Ⅲ）、高分割（Ⅳ）四类状态（后文空间 Markov 链分析采用相同分类标准），并通过转移概率矩阵识别状态跃迁规律。结果（见表 3）显示，市场分割状态转移呈现以下典型特征：

（1）各状态对角线概率值均高于同行其他转移概率（如状态Ⅰ→Ⅰ的概率为 0.502 8，显著高于向Ⅱ、Ⅲ、Ⅳ的转移概率），表明市场分割状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即某区域在特定年份处于高分割（或低分割）状态时，下一年大概率维持原状态。

（2）邻近状态间的转移概率显著高于跨状态转移（如状态Ⅰ→Ⅱ的概率为 0.340 8，远高于Ⅰ→Ⅲ的 0.111 7），印证市场整合是“边际改进”的渐进过程，难以实现跨越式跃迁。

（3）低分割状态（Ⅰ）保持或向更低分割状态转移的概率（Ⅰ→Ⅰ=0.502 8）高于向高分割状态转移的概率（Ⅰ→Ⅳ=0.044 7），高分割状态（Ⅳ）同理（Ⅳ→Ⅳ=0.482 8，Ⅳ→Ⅰ=0.049 3），表明市场整合存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正向路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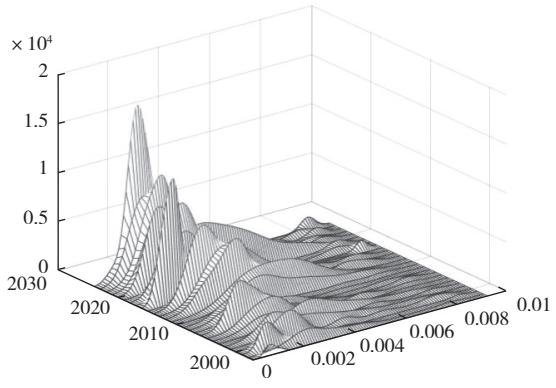
（4）通过计算 Markov 链的稳态分布概率，得到长期均衡时的各状态占比：低分割（Ⅰ）29.32%、中低分割（Ⅱ）27.85%、中高分割（Ⅲ）23.37%、高分割（Ⅳ）19.46%。这一结果提示，统一大市场建设要重点关注高分割状态。中高分割状态Ⅲ和高分割状态Ⅳ合计占比 42.83%，且存在双向流动性（如Ⅲ→Ⅳ=0.297 0、Ⅳ→Ⅲ=0.359 6），需要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引发市场在高/中高分割区间反复波动。统一大市场建设还要优化中低分割状态（Ⅱ）的转移路径。当前Ⅱ→Ⅰ（低分割）的概率为 0.351 8，而Ⅱ→Ⅲ（中高分割）的概率为 0.196 0，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进一步提高Ⅱ→Ⅰ的正向跃迁概率，推动市场从“基础整合”向“深度整合”演进。

表 3　中国市场分割指数传统 Markov 转移概率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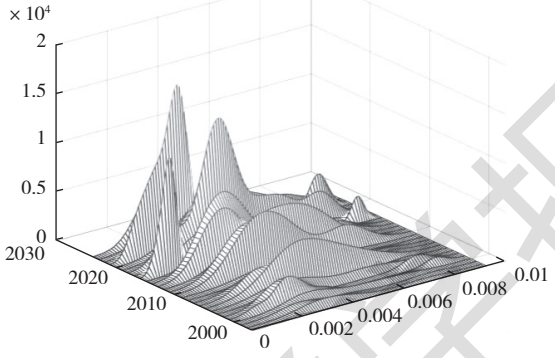
空间滞后类型	状态	Ⅰ	Ⅱ	Ⅲ	Ⅳ	观测值
无滞后	Ⅰ	0.502 8	0.340 8	0.111 7	0.044 7	179
	Ⅱ	0.351 8	0.386 9	0.196 0	0.065 3	199
	Ⅲ	0.163 4	0.212 9	0.326 7	0.297 0	202
	Ⅳ	0.049 3	0.108 4	0.359 6	0.482 8	203

2. 中国市场分割指数的核密度估计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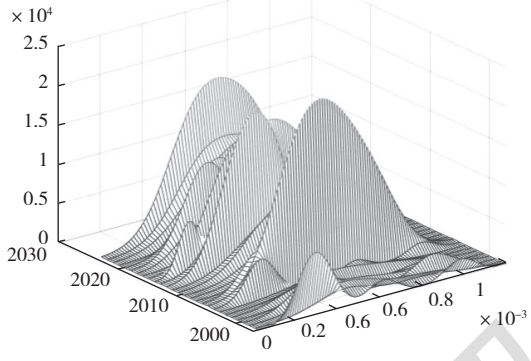
图 5 的结果显示，全国及各区域市场分割指数的分布形态呈现出一些典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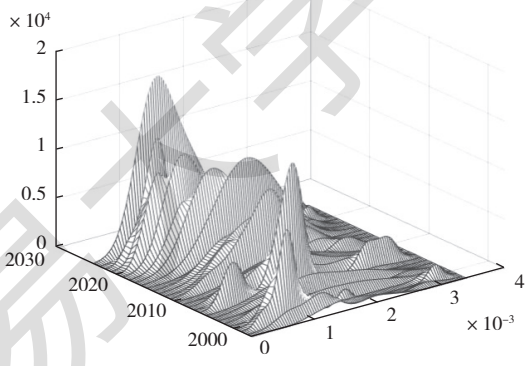
（a）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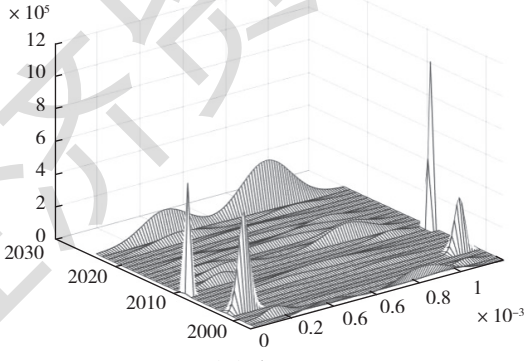
（b）东部地区



（c）中部地区



（d）西部地区



（e）东北地区

图 5　中国市场分割指数核密度分布

（1）主峰位置持续左移：主峰位置从 0.000 8（1997 年）逐步左移至 0.000 2（2024 年），表明市场整合水平整体提升，与前文 Dagum 基尼系数下降结论一致。

（2）峰值高度“收窄-放宽”循环：主峰高度从 1997 年的 5 000 增至 2024 年的 15 000，期间经历 2004 年、2008 年两次短暂下降，反映市场整合进程受外部冲击（如公共卫生事件、金融危机）影响呈现周期性波动。

（3）右拖尾现象加剧：分布曲线存在显著右拖尾现象（尾部概率从 1997 年的 5.2%升至 2024 年的 12.8%），且拖尾长度随时间延长，表明高分割区域与低分割区域的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

（4）单峰分布特征稳定：各年份核密度曲线均为单峰形态（峰值区间为［0.000 1，0.000 3］），未出现多极化现象，印证了全国市场整合的“集中度统一”特征。

（5）主峰分布趋势差异：东部与西部地区主峰位置除外界因素波动年份外，整体是从高值区域逐渐左移至低值区域，与全国趋势保持良好的同步性；中部地区主峰位置长期稳定保持在 0.000 6 附近，呈现较为标准的正态分布，反映出中部地区市场整合发展处于“稳态均衡、整体均质、进程平缓”的状态，与图 2 展示的趋势具有高度一致性；东北地区主峰多年呈“S”型变化，可能与样本数量与自身发展特性存在关联。

（6）东中西部主峰高度变化趋于一致：东部、中部和西部明显与全国一致，均是在特定年份（2004 年、2008 年）有下降趋势，整体呈现“收窄-放宽”循环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长期不存在明显主峰，但在 2024 年出现了峰值区间为［0.000 4，0.000 8］的双主峰，表明内部差异减小。

（7）主要地区右拖尾明显：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拖尾长度最长（尾部概率分别为 40.36%、24.09%），与地区内基尼系数对应，表明区域内部空间差距大；中部地区稳定的正态分布与东北地区样本量较小，使得这两个地区未产生明显的拖尾问题。

（8）各地区以单峰为主：内部子区域整合协同性强，说明具有重要核心城市起到影响作用；东北地区只有三个省份，且无强大核心城市存在，导致多年无明显主峰。

总之，三维核密度图进一步佐证了上文时空演化与差异分析的结果，同时揭示了市场分割指数“总体趋整合、局部显分化”的复杂格局。

（五）中国市场分割水平的空间演进趋势

1. 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识别市场分割水平的空间分布模式，本文采用二进制邻接矩阵（0-1 矩阵，用来定义空间单元是否相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 1997—2024 年中国市场分割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结果（见表 4）显示：中国市场分割在空间上呈现显著正自相关。除 2001 年（I=0.091 9，p=0.135 7）外，其余年份莫兰指数均为正值（范围 0.154 0~0.497 3）且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p<0.1）；其中，除 2022 年（I=0.115 5，p=0.064 6）仅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年份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市场分割水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高分割区域倾向于与高分割区域相邻，低分割区域倾向于与低分割区域相邻。

表 4　中国市场分割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z 值	p 值	年份	莫兰指数	z 值	p 值
1997	0.441 0	6.308 4	0.000 0	2011	0.415 2	3.735 8	0.000 1
1998	0.183 4	2.091 9	0.018 2	2012	0.347 8	3.406 8	0.000 3
1999	0.423 5	5.178 3	0.000 0	2013	0.351 9	3.434 1	0.000 3
2000	0.321 8	3.184 2	0.000 7	2014	0.382 4	3.692 3	0.000 1
2001	0.091 9	1.099 8	0.135 7	2015	0.346 5	3.322 1	0.000 4
2002	0.255 7	2.627 7	0.004 3	2016	0.372 3	4.997 9	0.000 0
2003	0.284 8	2.733 4	0.003 1	2017	0.251 9	2.925 2	0.001 7
2004	0.261 8	2.680 3	0.003 7	2018	0.254 6	2.830 3	0.002 3
2005	0.415 9	4.011 6	0.000 0	2019	0.462 2	4.150 6	0.000 0
2006	0.379 7	4.254 7	0.000 0	2020	0.154 0	1.958 6	0.025 1
2007	0.334 9	3.582 2	0.000 2	2021	0.471 4	4.478 9	0.000 0
2008	0.478 6	4.771 6	0.000 0	2022	0.115 5	1.517 5	0.064 6
2009	0.497 3	4.968 7	0.000 0	2023	0.393 7	4.315 2	0.000 0
2010	0.394 1	3.600 1	0.000 2	2024	0.216 8	3.087 3	0.001 0

注：p 值的显著性水平为 10%。

中国市场分割在空间上存在近邻效应。2009 年莫兰指数达到峰值（I = 0. 497 3），对应金融危机后地方保护政策的空间扩散；2020 年指数降至 0. 154 0，反映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区域封锁政策的局部性特征。这一波动印证了政策模仿机制对市场分割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地方政府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存在政策行为的空间邻近效应。

2. 空间依赖下的演进趋势

为直观揭示邻近区域对本地市场分割状态的影响，本文构建空间 Markov 转移概率矩阵，将“空间滞后项”（邻近区域的市场分割状态）纳入传统 Markov 链分析框架，结果见表 5。

表 5　中国市场分割指数空间 Markov 转移概率矩阵

空间滞后类型	状态	Ⅰ	Ⅱ	Ⅲ	Ⅳ	观测值
Ⅰ	Ⅰ	0. 535 4	0. 313 1	0. 111 1	0. 040 4	99
	Ⅱ	0. 434 8	0. 434 8	0. 087 0	0. 043 5	23
	Ⅲ	0. 000 0	1. 000 0	0. 000 0	0. 000 0	1
	Ⅳ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Ⅱ	Ⅰ	0. 460 5	0. 394 7	0. 105 3	0. 039 5	76
	Ⅱ	0. 439 0	0. 398 4	0. 130 1	0. 032 5	123
	Ⅲ	0. 333 3	0. 222 2	0. 333 3	0. 111 1	27
	Ⅳ	0. 500 0	0. 500 0	0. 000 0	0. 000 0	4
Ⅲ	Ⅰ	0. 500 0	0. 000 0	0. 250 0	0. 250 0	4
	Ⅱ	0. 120 0	0. 360 0	0. 380 0	0. 140 0	50
	Ⅲ	0. 176 0	0. 224 0	0. 296 0	0. 304 0	125
	Ⅳ	0. 135 1	0. 162 2	0. 324 3	0. 378 4	37
Ⅳ	Ⅰ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Ⅱ	0. 000 0	0. 000 0	0. 666 7	0. 333 3	3
	Ⅲ	0. 040 8	0. 163 3	0. 408 2	0. 387 8	49
	Ⅳ	0. 018 5	0. 086 4	0. 376 5	0. 518 5	162

中国市场分割的空间近邻效应显著。当邻近区域为高分割状态（空间滞后Ⅳ）时，转向更高分割状态的概率（如Ⅲ→Ⅳ = 0. 387 8）显著高于无空间滞后情境（0. 297 0）的概率，表明高分割邻近环境会强化本地分割的“锁定效应”；当邻近区域为低分割状态（空间滞后Ⅰ）时，本地向更低分割状态转移的概率（如Ⅱ→Ⅰ = 0. 434 8）高于无空间滞后情境（0. 351 8）的概率，印证了低分割邻近环境对本地整合的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市场分割在空间条件下存在空间路径依赖。对角线概率值趋向邻近类型的概率值增大（如空间滞后Ⅰ下Ⅱ→Ⅰ = 0. 434 8，Ⅱ→Ⅱ = 0. 434 8），说明粘性效应在空间维度依然存在，但邻近区域的状态会调节粘性强度。

跨越式转移在空间条件下存在复杂的空间偏移，但总体上呈现出“向邻居看齐”的趋势，即中低分割状态（Ⅱ）在低分割邻近环境下向高分割（Ⅳ）转移的概率仅为 0. 043 5（原 0. 065 3）。中高分割（Ⅲ）在高分割邻近环境下向低分割（Ⅰ）转移的概率为 0. 040 8（原 0. 163 4），跨越式转移概率均有下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1997—2024 年省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采用价格法测度中国省际商品市场分割指数，结合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Markov 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系统揭示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空演变规律与区域差异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商品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样本期内全国商品市场分割水平整体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市场整合取得明显成效。同时，部分年份市场分割出现波动反弹，反映地方政府在应对冲击时的短期保护行为容易打断整合节奏，市场韧性仍待提升。

第二，区域市场整合水平呈现分化特征。四大经济区市场统一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属于高内部差异区域；东北地区内部整合程度最高。区域间差异层面，东部与东北地区是差异最大的区域对，中部与东北地区是差异最小的区域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东部地区组内差异明显扩大，提示东部沿海省际壁垒有抬头趋势。

第三，区域间差异是整体市场分割的核心来源。分解结果显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市场分割的贡献度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是空间异质性的核心驱动因素；区域内差异贡献度相对较低且较为稳定，但近年呈现小幅上升趋势；超变密度贡献度近年持续上升，反映区域间政策协同不足导致的“碎片化整合”风险逐步凸显。总体来看，区域差异仍处于较高水平，是制约全国市场统一程度提升的关键因素。

第四，市场分割状态存在显著的粘性与空间集聚特征。市场分割状态具有较强的自维持性，区域一旦处于某种分割状态便容易长期维持，且状态转移以渐进式改进为主；同时，市场分割在空间上呈现显著正向集聚效应，高分割区域与低分割区域均会对邻近地区产生同方向影响，政策模仿是空间传染的核心机制。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破解区域差异短板、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要求，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攻坚高分割区域粘性治理，打破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壁垒。针对高分割状态的锁定特征，建立“重点区域攻坚机制”，对东部沿海等长期高分割区域制定跨省市一体化专项方案，统一要素市场准入、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基础规则，清理地方政府出台的隐性采购偏好、技术壁垒等保护政策。探索区域市场整合成效与财政转移支付、政绩考核挂钩的激励机制，对主动降低省际贸易壁垒的省份给予税收返还、项目倾斜奖励，引导地方政府打破市场分割的政策惯性。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产业引导政策，推动东部沿海省份构建错位分工的产业体系，减少同质化竞争导致的保护动机，同时依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建设，率先推动区域内部市场一体化，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构建外部冲击应对机制，防范外部冲击下的分割反弹。针对三次外部冲击下的分割反弹特征，建立“危机预警–政策对冲–长效修复”的全链条应对体系：冲击初期依托全国统一的应急物资调度、跨区域能源保供等平台，禁止地方政府擅自实施区域流通封锁政策；冲击中期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补偿地方稳增长、保就业的成本，弱化地方政府的保护动机；冲击后期开展统一市场建设专项督查，清理应急阶段出台的临时性保护政策，快速恢复市场整合进程。同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妨碍统一市场政策文件清理台账，定期向社会公开通报典型案例，从制度层面降低冲击下的保护冲动。

第三，强化区域政策协同，破解区域间差异引起的矛盾。针对区域间差异贡献度占比超 70%的特征，建立国家级跨区域政策协调机制，对涉及省际流通、产业布局、生态补偿等领域的政策，由相关区域共同制定、联合执行，降低区域间规则摩擦。针对超变密度上升的碎片化风险，推广跨区域税收分享、产业转移利益联结、生态保护补偿等机制，破解行政边界导致的利益分割。对于低分割集聚区，加大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入，强化其正向溢出效应；对于高分割集聚区，建立联合执法、政策互认的协同监管机制，遏制高分割的空间溢出效应。

第四，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强化统一市场建设的制度保障。改革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弱化 GDP 增速考核权重，增加要素流动效率、省际贸易规模、市场整合程度等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从“地方保护”转向“协同开放”。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动态监测体系，定期发布各地区、各区域分割指数与整合成

效排名，对排名靠后、保护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约谈通报。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扩大全国市场总容量，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的生存土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基本建成”向“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升级。

参考文献：

[1]陈甬军.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理论和重点路径[J]. 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23(5):35-44.

[2]丁俊发. 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与实施[J]. 中国流通经济,2022,36(6):3-9.

[3]Naughton B.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Z].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58,2000.

[4]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1):1-21.

[5]喻闻,黄季焜. 从大米市场整合程度看我国粮食市场改革[J]. 经济研究,1998(3):50-57.

[6]桂琦寒,陈敏,陆铭,等. 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J]. 世界经济,2006(2):20-30.

[7]陈敏,桂琦寒,陆铭,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08(1):125-150.

[8]陆铭,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 [J]. 经济研究,2009(3):42-52.

[9]胡向婷,张璐. 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05(2):102-112.

[10]范欣,宋冬林,赵新宇. 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 [J]. 经济研究,2017,52(2):20-34.

[11]魏楚,郑新业. 能源效率提升的新视角:基于市场分割的检验[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0):90-111.

[12]吕冰洋,贺颖. 迈向统一市场:基于城市数据对中国商品市场分割的测算与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4):13-25.

[13]吴华强,才国伟,何婧. 新发展格局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J]. 南方经济,2022(7):54-68.

[14]陈甬军. 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区封锁生成机制及其解决对策[J]. 财贸研究,2023,34(4):24-32.

[15]马鑫,黄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间市场整合:以高速公路为例[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12):111-132.

[16]柒江艺,阳立高. “世界市场网”视角下金融危机的贸易传导:基于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重新审视[J]. 经济问题探索,2016(12):98-106.

[17]赵静梅,李钰琪,钟浩. 数字经济、省际贸易成本与全国统一大市场[J]. 经济学家,2023(5):89-99.

[18]夏杰长,李銮淏,刘怡君. 数字经济如何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经验[J]. 经济纵横,2023(2):43-53.

[19]宋枫,冯彦博,黄阳华,等. 协同视角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事前评估研究:以电力市场为例[J]. 经济研究,2025,60(6):152-169.

[20]林晨,李宇潇.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产业政策竞争[J]. 经济研究,2024,59(12):40-57.

[21]龚锋,马旭. 地方政府合作的增长与协调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2026,61(2):24-47.

[22]陈斌开,赵扶扬. 外需冲击、经济再平衡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基于动态量化空间均衡的研究[J]. 经济研究,2023,58(6):30-48.

[23]郑毓盛,李崇高. 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J]. 中国社会科学,2003(1):64-72.

[24]陈甬军,陈义国,宴宗新.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路径选择:基于地区间经济波动溢出效应的研究[J]. 财经科学,2024(1):103-116.

[25]谢一青,邵军. SARS 的经济影响以及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经济影响的启示[J]. 上海经济,2020(3):5-17.

[26]薛荣久. 中国入世后十年的六大挑战与应对[J]. 国际经贸探索,2012,28(3):4-14.

[27]罗富政,何广航. 政府干预、市场内生型经济扭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 财贸研究,2021,32(2):30-42.

[28]吴丹,胡振华. 基本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实证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41(4):39-45.

[29]王昀,孙款款. 国内产品市场从分割走向整合了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2023(3):98-108.

[30]田巍,余淼杰.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3(1):28-44.

[31]张学良,程玲,刘晴. 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企业内外销[J]. 财贸经济,2021,42(1):136-150.

[32]谢贞发,王震. 地区间税收分成差异与资本要素流动:以企业异地投资为视角[J]. 经济研究,2025,60(04):87-103.

The Regional-Level Measurement and Balanced Promotion Path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HEN Yongjun[1,2], CHEN Yiguo[1]
(1.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2.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o eliminate the bottlenecks hin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advance its in-depth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address the prominent shortcoming of unbalanced and uncoordinated progress in unified market construction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pecialized study focusing on the commodity market dimension and adopts the price method to estimate the commodity market segmentation index among Chines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from 1997 to 2024. It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rules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onstruction, aiming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commodity market perspective for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ath.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commodity market segmentation level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and market integr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owever,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market integration levels among regions, and the market unification degree of the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ranks from high to low as follows: northeastern region, central region, western region, and eastern region.

The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differences shows that inter-regional disparities a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while the contribution of intra-regional disparities is relatively low and remains stable. The trend evolu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both high-segmentation and low-segmentation regions have a "sticky effect", which means once a region is in a certain segmentation state, it tends to maintain this state for a long time; meanwhile, market integration is a gradual process of "marginal improvemen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leapfrog transition.

In term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assimilation agglomeration effect: Regions with high (or low) segmentation levels will drive neighboring regions to shift towards high (or low) segmentation levels, thus forming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market segment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s and policies for the balanced promotion of regional unified marke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posal adopted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resolutely eliminate the bottlenecks hin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Key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ommodity market segmentation; regional disparities; sticky effect; market integration

(编校：姚望春)